

世紀末解構的歐洲： 後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限 與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

* 本文原載《當代》一三九期：pp. 80-93。

孫治本

一、前言

太多彼此矛盾的潮流在據稱已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世界中洶湧澎湃。數年前福山剛宣稱了歷史的終結，經濟全球化似乎真地可以弭平所有的疆界。而事實上，全球化已在歐洲福利國家重新燃起了左派與右派間的戰火。全球化，似乎也要將民族國家丟進歷史的記憶中，不僅是驚人的跨國、跨文明的企業兼併，區域整合也讓人開始聽到後民族國家時代來臨的腳步。然而，冷戰後的再民族國家化，又讓我們看到民族—國家主義的熊熊烈火。

歐洲，矛盾中的矛盾區域，是躲不過任何一把烈火的。冷戰時代的東、西對峙結束了，歐盟追求進一步的整合，且與北約一起發出了向東歐擴展的宣言。全球化的體驗，歐盟的實例，讓人覺得傳統的民族國家模式不適用了。然而，新的，但也是非常古老的界線又（仍）在分化歐洲。即使是民族國家的功能衰退了，受民族—國家認同制約的強權遊戲，依然在進行中。

以下，我們先從文化的層次（而不是從制度的層次），介紹一種後民族國家思維，亦即德國社會學家貝克 (Ulrich Beck) 的跨國國家模式，以點出歐盟的特殊性，即對其更進一步的後現代期望。接著，我們想談談古老的歐洲文化界限在當今歐洲的作用。然後，我們會看到，歐洲的民族國家不但仍堅持其存在的意義，

而且一如既往，逃不過對均勢或強權的選擇。

二、貝克的跨國國家模式 —後民族國家時代的國家觀

貝克的跨國國家模式，一方面肯定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一方面也是對付全球化的無秩序的一種政治架構。全球化的浪潮使跨國行動者（跨國企業集團、跨國非政府組織）越來越強勢，民族—國家的功能則相對地式微了。然而貝克認為，國家模式雖然老舊了，卻不可放棄。這主要不是為了保障傳統上所謂的國家主權，而是因為全球化引起的問題，有賴國家間的合作來規範和解決 (Beck 1997: 184)。在國家功能式微的全球化時代，個別國家各自採行對策必然徒勞無功，只會摧毀國家政治，唯有跨國合作才能延續國家政治的意義 (ibid.: 188)。

因此，貝克反對民族—國家孤立地以保護主義來對抗全球化浪潮。然而，人類因此就該建立起一種大一統的「世界國家」，以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脫序問題嗎？這亦是貝克所反對的，因為世界國家的建立亦意味著可怕的全球權力集中時代的來臨 (ibid.: 184)。貝克主張的模式是「跨國國家」(Transnationalstaaten)(複數)。簡單地說，跨國國家模式即是一種國家間的合作模式，然而這與傳統的國際合作模式有何不同呢？這便牽涉到其對國家的看法。

依照貝克的說法，跨國國家並非由民族國家、領土國家所組成，亦即貝克不再認同傳統的民族國家概念。然而跨國國家模式還是肯定國家概念，只不過此模式下的國家概念與傳統民族國家間的區別在於：新概念承認發生於經濟、文化、政治等諸層面中的全球性是一無法逆轉的事實；新概念認為（國內）政治已與跨國決定和跨國組織密不可分 (ibid.: 185-186)。

因此貝克認為，是公民對在內政上可察覺到的全球問題的關

心，促使了跨國合作的進行，因此他以跨國內政 (transnationale Innenpolitik) 的概念取代國際關係的概念 (ibid.: 184-185)，依筆者之見，其理由是雙重性的：其一，全球問題也就是內政問題；其二，全球化使各國的內政交織在一起。

貝克又認為，他理想中的跨國國家也非國際國家 (Inter-Nationalstaaten) 或超民族國家 (Supra-Nationalstaaten) (亦即區域世界國家)，因為在後兩種模式中，傳統的民族國家依然是主要的關涉點 (ibid.: 186)。所以，歸根究底，民族在貝克的模式中，已經失去了重要性。而談到文化的互動甚至政治座標系，貝克以全球化—地方化的雙軸座標系取代了民族國家間的互動模式 (ibid.: 186)。

因此，貝克也將跨國國家視為全球地方國家，將其理解為世界社會下的省份 (ibid.: 186 & 223)。貝克借用 Roland Robertson「全球地方化」(Glokalisierung) 的概念，說明全球化與地方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當今同步壯大的潮流。在他看來，普世主義與特殊主義是可以兼容並蓄的 (ibid.: 88-92)。從前民族國家間清楚的界限逐漸模糊了，跨國國家並不俱有單一的權威和單一的認同，其它地區的和世界社會的權威、次國家的和次民族的權威，都可能成為公民的忠誠對象。社會—政治的聯繫和認同，已經成為全球的、地區的、民族—國家的和地方的因素交織影響下的多元產物 (ibid.:191)。

貝克認為，歐盟俱有成為跨國國家的潛力 (ibid.: 263-264)。然而，若與其它有關歐盟建構原則的爭論 (主要是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爭論，詳見下文) 比較，跨國國家模式是較近於超國家主義還是政府間主義呢？由於貝克全未論及具體的制度，我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不過，貝克的跨國內政概念，確能形容當今歐盟的實際運作情形。更重要的是貝克新穎的國家觀念。一般主張超國家主義的德國政治菁英，或者主張德國應(在某種程度上)放棄國家主權，以達成歐盟的進一步整合，但仍可(應)保留民

族認同；或者主張兩者皆可拋棄。而貝克則主張一種不俱民族意涵的國家。又，有關是否應放棄國家主權以達成歐盟進一步整合的問題，德、法、英之間有相當不同的看法（詳後），然而貝克認為其跨國國家模式中的思考邏輯完全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因為跨國合作能產生「更多的主權」，使跨國權力集中和個別國家均能獲益（ibid.: 190-191）。

貝克的國家是後現代的，或者用他的辭彙，是屬於「第二次現代」的（有關第二次現代，詳 ibid.: 25）。去除民族意涵的國家，似乎只是全球社會中的一個功能組織；民族和國家，已不再能作為文化的座標，新的座標系是全球文化與地方文化的辯證關係。貝克以其認為普世主義和特殊主義能兼容並蓄的胸襟，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傳統的文化界限與民族認同問題。對他而言，一個「後民族國家」（ibid.: 223）時代無疑要開始了。然而，當今的世界，甚至當今的歐洲真地是如此嗎？

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以及認為冷戰後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又復活了的論點，使我們看到了另一股趨勢。即使只把目光放在歐洲，我們亦可發現，文化界限不但是古老的，它的作用而且是現時的。

三、歐洲文化界限

歐洲的東界—

或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間的界限

杭亭頓在「文明衝突」一書中提出「歐洲是甚麼？」「歐洲開始於何方，止於何處？」的問題（Huntington 1996: 251）。事實上，冷戰結束後，「歐洲是甚麼？」或至少在（較廣義的）歐洲內部該如何劃界的問題，浮現在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心頭。越來越多的西歐菁英開始主張，這個問題應該上溯到東、西羅馬帝國及希臘

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的分裂去尋找答案。亦即，歐洲的範圍限於信奉羅馬天主教以及宗教改革後信奉基督新教的國家。如此說來，東正教國家便不屬於歐洲（或者說，歐洲分成兩個世界，東正教國家是其中之一）。至於原屬共產政營，但信奉羅馬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東歐國家，應該是屬於西方(歐洲)的 (ibid.: 251-254)（筆者按：居民大部信奉羅馬天主教者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匈牙利及立陶宛，信奉基督新教者為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希臘反成了歐盟內的異數，與其他歐盟成員國相較，被認為作風迥異 (ibid.: 258-260)。

以宗教作為劃分歐洲東界或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間界線的標準，固然有其適用性，但仍應將宗教線與種族線對照觀察。大體說來，兩條線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亦即，東正教的主要成員屬斯拉夫民族，然而仍有例外，即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等國屬斯拉夫民族，卻信奉羅馬天主教。筆者認為，這幾個國家應歸類為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間的灰色地帶，因為從宗教上而言，他們屬於西方，從種族和語言而言，他們卻屬於東方的斯拉夫世界，況且就地緣關係而論，他們正處於東、西方的交會地帶。

因此，如果說歐盟及北約的東擴計劃，考慮接受這些國家為成員，卻很難想像塞爾維亞、俄羅斯等信奉東正教的國家加入歐盟、北約，是根據宗教劃分的文化界限的作用，則不可忽略的是，屬於灰色地帶的國家在種族上是與西邊的日耳曼人隔隔不入的。尤其波蘭、捷克兩國，與德國的恩怨情愁，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完全化解開的（可參閱 Ruges 1990, Schulz-Vobach 1989, Thurich 1990）。

歷史遺產的影響是巨大深遠的。從希臘、羅馬文化間的競爭，到東、西羅馬帝國及教會的分裂，然後是羅馬天主教世界的新成員日耳曼人與東正教世界的新成員斯拉夫人在廣大的中、東歐爭奪生存空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看到這條文化界限的

作用，奧地利與塞爾維亞間的衝突，分別獲得德國與俄羅斯的奧援，複雜的連環結盟關係，在一位日耳曼皇儲被一名斯拉夫刺客謀殺於薩拉耶佛後，引起歐洲各國一連串的彼此宣戰，揭開了一次大戰的序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與蘇聯（以俄羅斯為主體）決戰於東戰場，最後德國戰敗，不僅是上述的灰色地帶，連德國的東部都納入俄羅斯人的勢力範圍，日耳曼的勢力則向西退縮。冷戰的結束，則是斯拉夫力量的衰退，位於灰色地帶的國家，再度倒向西方，德國則大力東進。

以上我們大致同意了杭亭頓等學者有關歐洲東界的說法，但結合了種族界線的觀察，以灰色地帶的概念作補充。然而，兩個歐洲的內部亦非高度整合的文化世界，即以西方歐洲而論，其內部便存在著另一條重要的文化界限。以下我們以羅康（Stein Rokkan）建立的歐洲地誌學—類型學概念圖來說明。

羅康:歐洲的地誌學—類型學概念圖 **—西方歐洲內的文化界限**

早期研究歐洲各國政黨政治的羅康，發現各國在大眾民主結構上的差異，無法單從橫剖面的社會結構解釋，因此他轉而從歷史過程中尋找原因，仔細研究了近代歐洲國家與民族的建構過程（Rokkan 1980: 118-119）。由於他的研究結合了文化、經濟與地緣因素，因此他稱他的模式為地誌學（地緣因素）—類型學（文化類型、經濟類型）模式（Flora 1981: 403; Rokkan 1980: 123）。與前述的觀點一致，羅康所謂的歐洲是西歐，具體而言，其範圍是 1054 年東、西教會分裂後，羅馬天主教的勢力範圍（Flora 1981: 402）。

羅康認為，要解釋歐洲各國在國家、民族建構歷史過程中的差異，有四個主要變項（master variables）是不可忽視的：世俗的/宗教的殊化；語言的同質性/異質性；城市網絡的殊化/自治；土地所有的集中/分散（Rokkan 1973: 88-90）。而歐洲國家、民族建構的四個基本政治發展過程是：國家建構（亦即（政治）中心建構）；

民族建構（亦即文化統一）；政治參與權的制度化（係為因應參與挑戰）；社會分享權的制度化（係為因應分配挑戰）（Rokkan 1975: 570-572; Flora 1981: 400）。而從具體的歷史過程觀察，有六大歷史因素對於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政治實體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六大因素又可各自置於領域（權利與權力）、經濟和文化三種範疇之下：

領域（權利與權力）：

1. *羅馬帝國的遺產*：皇帝的至高權力、權利規範的系統化、公民和公民權的觀念；

2. *日耳曼諸王國的遺產*：自由氏族首領集會立法和審判的傳統；

經濟：

3. *南起義大利、北迄佛蘭登（Flandern；今天的荷蘭與比利時）*，包含許多自由城市的長條狀區域的興起，此一長條狀區域的興起，源於回教徒勢力衰退後，亞洲、地中海和北海區域間貿易的恢復；

4. *封建和地主農業結構的發展*，在不同的地方，土地集中程度和佃農自由程度有著很大的區別；

文化：

5. *羅馬教會作為一個超疆域和超種族的組織*，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成為歐洲菁英份子的溝通管道，同時也成為藉由復蘇羅馬法追求歐洲整合的中心象徵；

6. *方言書寫文字的產生*，使拉丁文作為跨種族溝通工具的意義逐漸消失（Rokkan 1975: 575; Flora 1981: 402-403）

以上第一和第二項因素屬特殊的政治遺產，後四項因素則為四個「主要變項」在歐洲的實際表現（Flora 1981: 402）

羅康用第三和第五項因素（前者屬經濟因素，後者屬文化因

素)，與地緣結構結合觀察，建構起他的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概念地圖」：第三項因素——「包含許多商業城市的長條狀區域」，實為資本主義剛萌芽時歐洲最繁榮的商業區域（然而，十六世紀初起，西歐沿岸及橫越大西洋的海上商業路線日益重要，這條南北向的陸上商業路線的重要性便相對地降低），它構成了此一概念地圖的經濟軸，從地緣關係來講，這是一條南北向的縱軸，其本身是當時歐洲商業最發達的區域，其東、西兩邊，概略而言，距其越遠，商業化的程度就越低。第五項因素，羅馬教會的影響，決定了一條文化軸的形成，這是一條東西向的橫軸，在這條軸的南邊，羅馬教會的文化影響力十分穩固，越往北邊，這種影響就越弱 (Rokkan 1975: 576-579 & 1980: 123; Flora 1981: 403)。

第三項因素決定的縱軸，是涉及前述四個主要變項的頭兩個變項（土地所有的集中/分散、城市網絡的殊化/自治）的一條差異線：位於縱軸上的城市多為商人統治的自由市。其東、西方廣大區域的城市，則多處於寡頭統治之下，不過，在形態上又東、西有別。西邊的城市，在大西洋商業路線興起後，繁榮的商業和高貨幣化程度，使西方得以形成經濟實力雄厚的中心城市。東邊的城市，由於貿易量要比大西洋區域小得多，實力較弱，統治者對農業經濟的依賴較深。縱軸決定了日後歐洲國家建構的形態。包含許多自由市的縱軸，是昔日西羅馬帝國的核心區域，由於富裕、俱自治權的城市多，難以形成政治中心，因此，除了荷蘭和瑞士，此一區域較晚才納入統一的國家之下（亦即義大利和普魯士以外的德國的情形）。其東、西邊的廣大區域，則較易形成政治中心，故國家的建立較早 (Rokkan 1975: 576-579 & 1980: 123; Flora: 405 & 408-411)。不過，前面已經提及，西邊（如法國、英國）的商業城市較發達，東邊（如普魯士、奧地利）的政治中心，則對農業的依賴較深。

第五項因素決定的橫軸，則為涉及前述四個主要變項的後兩個變項（語言的同質性/異質性、世俗的/宗教的殊化）的一條差

異線：在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區域，教會阻礙了民族的建構，因為羅馬天主教追求的是跨地域、跨種族的影響力。在信奉新教的北方，則發展出國立教會，在群眾的民族化和民族語言的標準化上，國立教會扮演著關鍵角色 (Rokkan 1975: 577-581; Flora 1981: 405)。橫軸決定了歐洲民族建構的形態。

羅康的文化界限（包括歐洲的東界及歐洲內部的文化軸）主要亦以宗教作標準，然而這條重要的歐洲南、北文化界線，亦應與種族界線對照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方的新教世界，大致上屬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南方則為拉丁民族（包含被拉丁化的塞爾特 (Celt) 民族）的世界。然而兩者之間亦有灰色地帶。從前西羅馬帝國的版圖，今日大部信仰羅馬天主教。然而德國的中西部、南部，從前屬於西羅馬帝國，今日亦仍為羅馬天主教的版圖，卻很早就是日耳曼人的勢力範圍。如同前述對歐洲東界的討論，灰色地帶出現於宗教界限與種族界限不一致時。至於英國，可說是灰色地帶中的灰色地帶。英格蘭曾經隸屬羅馬帝國，深受拉丁文化的影響。然而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日耳曼文化在大不列顛逐漸擴展。表現在語文上，英語被歸類為西日耳曼語，70%的字彙卻是來自拉丁文；表現在宗教上，亨利八世與梵諦岡決裂，自創英國國教 (the Anglican Church)，然而英國國教的教義卻仍與羅馬天主教近似。

宗教改革因此可以視為是一場日耳曼運動，是歐洲南、北文化衝突的具體表現，亦即日耳曼人對拉丁文化的反抗（參閱 Rokkan 1975: 581）。1871年德國統一後，普魯士徹底征服了「灰色地帶」，俾斯麥隨即發動「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對抗天主教的勢力（參閱 Deutscher Bundestag 1989: 194）。德意志民族和法蘭西民族數百年的競爭與衝突，亦是延著文化界線進行，衝突最激烈的地方，當然是在灰色地帶。

然而與歐洲東界有所不同，今天這條歐洲內部的南、北文化界線已經不再是重要的衝突線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德、法逐漸

成為重要的盟友，一反從前法國聯合斯拉夫民族制衡德國的傳統，此為戰後歐洲地緣政治上最重要的變化。

南、北文化界線雖已不若歐洲的東界來得重要，然而在歐盟內部，我們仍可看到德、法、英三國玩著最傳統的均勢 vs. 霸權的遊戲。許多時候，衝突確實延著文化界線進行，然而不可忽視的是，一個大文化單位下的民族國家，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因此，我們要避免文明衝突論使我們見林不見樹，只思考大文明間的衝突，卻忽略了民族國家(往往是同一文明圈下的國家)才是人類衝突的最主要單位。

在全球化的後現代，在德國人因為歷史經驗、全球化的啟示、安全政策的考量，逐漸在民族—國家的認同上出現了一些模糊的主張，並欲以歐洲認同取而代之的今天，我們仍可看到強大的歐洲民族國家，各自在宣示其主張、擴展其利益。

四、歐洲整合過程中的歷史幽靈

—均勢 vs. 霸權

二次大戰以後，民族與國家認同對德國人而言成了一項困難、複雜、敏感的問題。史學家 Christian Meier 在「一個無人想成為的民族」(Die Nation, die keine sein will) 一書中，指出德國人在民族—國家認同上的困難，肇因於三段歷史經驗：其一，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形成，較其他歐洲國家較晚的歷史事實；其二，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伴隨著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名發生的重大罪行；其三，東、西德分裂的歷史經驗，以及東德共產政權垮台後，雙方人民對是否仍能共同成長的懷疑 (Meier 1991: 19)。

事實上，基於歷史的教訓，及冷戰時代德國的處境和歐洲情勢，戰後德國的安全政策即以德國的融入歐洲為指導原則。誠如另一位史學家 Stürmer 所說的，歐洲的統一，主要是德國的利益

(Stürmer1988: 179)。對於德國融入歐洲、歐洲進一步整合的追求，自然構成了另一種對德國民族—國家認同的衝擊。

德國由於地處東、西歐的中間地帶，且自十九世紀起逐漸崛起為歐陸強權，與鄰國時有衝突。二次大戰後，為了避免歷史重演，德國以歐洲整合和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us) 為其安全政策之主要指導原則 (Voigt1996: 107)。這就如同史學家 Hans-Peter Schwarz 所指出的，數度捲入歐洲國家間的衝突，使部份德國人對一個多國家的歐洲只剩下負面的印象 (Schwarz 1994: 102-103)。以整合的歐洲取代多國紛擾的歐洲，是否是德國人最自然的選擇。冷戰結束後，德國不但沒有放棄此項政策，反而更為強化。例如德國之所以大力推動歐盟和北約向東歐擴展，照德國的說法，其理由之一是因冷戰後德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日益密切，德國擔心其與東歐間的雙邊關係又會破壞歐洲的均勢，故急於將幾個東歐國家整合入歐盟與北約中，以稀釋德國與這幾個國家間關係的重要性，也就是以多邊主義的架構(西歐各國對東歐)取代雙邊架構(德國對東歐) (Voigt 1996: 108-110)。這也可以減輕其他國家對「德國將再度成為霸權」的疑慮 (Peter Schmidt 1996: 213 & 219)。德國甚至認為，將東歐國家納入歐盟與北約，可以阻止此一地區的「再民族國家化」，而這些國家的再民族國家化，會成為其擴張軍備的動機 (Voigt 1996: 111)。似乎，「解民族國家化」就是部份德國菁英心目中歐洲永久和平的良方。

歷史的負面經驗及安全政策上的考量，使德國積極追求歐洲的整合，作為德意志靈魂困擾因素的民族—國家意識，似乎理所當然地不構成歐洲整合的障礙，因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民族—國家主義原本就是應當被放棄的。是故，在歐盟進一步一體化的具體策略上，德國支持「超國家主義」(Supernationalismus)，從制度層面而言，主張歐盟必須進行下列變革：各成員國將更多的執行權交予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在歐盟決策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歐盟各部長諮議會的決策方式由一致決改為多數決

(Masala 1997: 228)。換言之，歐盟成員國應該放棄一部份主權。

德國認為歐洲整合是防止歐洲出現新霸權，尤其是防止德國成為霸權（或者說防止其他國家形成此種疑慮）的最佳策略。然而另兩個歐洲強國—英國與法國，卻不如是想。尤其是英國，完全從相反的角度思考，懷疑德國之所以致力於強化歐盟整合及推動歐元之實施，是欲藉此法成為歐洲新霸權 (Elvert 1997: 346)。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露骨地說，德國所要的並非立基於歐洲的德國，而是立基於德國的歐洲 (Elvert 1997: 353)。亦即，一個大一統的歐洲，必然是臣服於歐洲第一強國德國腳下的歐洲。這種歷史性的對破壞均勢的恐懼，使柴契爾夫人於柏林圍牆開放後，暗地裡主張即使不能阻止德國的統一，也要延緩其速度 (Elvert 1997: 353)。英國人對德國是有一種潛在的疑慮甚至敵意的，這不僅可以從八卦報紙的諷德言論看出，曾有一項問卷調查顯示，78%的受調查英國人，聽到「德國」一詞時，會聯想到戰爭；近 53%的受調查英國人擔心納粹思想會在德國再度興起 (FAZ, 1996.11.8)。

因此，要歐盟成員國犧牲部份主權的超國家主義，無法獲得英國政治菁英的認同。他們堅持歐盟作為民族國家的合作架構，而歐盟成員國主權的表現即是一致決的決策方式 (Masala 1997: 228)。例如由部份英國政治家和學者組成的 Brügge 團體，便堅持歐洲必須是民族國家組成的歐洲，歐盟應該是一個國家聯盟，而反對歐盟朝聯邦的方向演變 (Elvert 1997: 349)。與超國家主義相對，此即所謂的政府間主義 (Intergovernmentalism)。

至於法國，其與（表面）含蓄的德國不同，一向不忌諱顯示自己的強大（但德國統一後，法國國力屈居德國之下，已是明顯的事實）。自從戴高樂以來，法國致力於使歐洲成為世界強權，並期望自己在歐洲的外交政策上扮演領導角色。法國與德國，無疑是當今歐洲整合的兩大推動者。然而對於歐洲的架構，法國卻向來較偏愛政府間主義。與德國一樣，法國也贊成將歐盟諮議會的決策方式由一致決改為多數決，但法國反對強化歐洲議會的權

力，使其成為執委會的主要監督機關，並認為各成員國的國會應更深地介入歐盟的決策過程（這是政府間主義的一種明顯表現）。英國則不但反對歐洲議會的擴權，也反對改變諮議會一致決的決策方式 (Masala 1997: 229-234)。

追求歐洲整合，不惜讓出部份國家主權的德國，到底是在將自己推向新霸權之路，還是在防止自己成為霸權？曾經對德國人造成重大傷害的民族—國家主義，德國人真地能置之不理嗎？就像貝克，輕輕鬆鬆地提出跨國國家模式，真地是世界，或至少歐洲，得以歡欣地進入後民族—國家時代嗎？

如同德國政治學者 Graf von Krockow 所指出的，眾所周知的德國問題是：「追求和諧的渴望越強，衝突就越劇烈。」(Graf von Krockow) 無怪乎英國史學家 Norman Stone 要說，德國忽視本身的民族和國家認同問題，卻致力於歐洲的整合，對歐洲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Handelsblatt, 1993.5.13)。德國前總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亦說，歐洲絕非已進入了「後民族—國家」(postnational) 時代，如果單單是德國人宣稱要走上後民族—國家的特殊之路，德國的鄰國是不會相信的；他們會認為，德國不是無法維持此一特殊之路，就是根本不願維持 (Helmut Schmidt 1990: 83)。

不，即使在全球化的後現代，古老的文化界線仍在分割人類的思維，民族國家仍在霸權與均勢中做抉擇。對德國而言，歐盟和北約的東擴，是歐洲和平的不二法門。但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計劃卻有激烈的反彈，此並助長了其國內的愛國主義 (Simon 1997:253-254)。俄羅斯很難接受冷戰後其於中、東歐喪失影響力的事實，其受到刺激而高漲的民族主義，又使灰色地帶的中、東歐諸國備感威脅，紛紛向西方尋求支持 (Simon 1997:255)。

再看前南斯拉夫，二十世紀德國灰暗命運的引爆地，在冷戰結束後，又與新德國的未來命運交織在一起。二次大戰時，德國曾聯合克羅埃西亞迫害塞爾維亞人；在後冷戰時代，德國則是第一個承認克羅埃西亞獨立的西方國家，逼得其他歐盟國家不得不

跟進承認。至於俄羅斯，基於種族、宗教和歷史上的淵源，當然是支持塞爾維亞的 (Hoppe 1997:267)。而當德國大力支持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的回教徒時，法國和英國卻仍對塞爾維亞保持傳統的同情 (Hoppe 1997:276) (此即傳統上英、法聯合斯拉夫國家制衡德國的策略)。

所以，曾任德國駐多國大使的 Hans Arnold 即指出，從 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到 1945 年的雅爾達會議，歐洲安全政策的主軸即是：各強權致力於追求符合其國家利益和企圖的均勢。即使在冷戰期間，在東、西兩大集團的內部，此一目標亦被默默地追求。在後冷戰時代，依然如此 (Arnold 1997: 40)。德國大力推動歐盟、北約的東擴，其實是對俄羅斯的一種圍堵，防止其再度成為霸權，並使自己從西方安全體系的第一線，退居到第二線 (波蘭、捷克等國則被推上了第一線)。統一後成為歐洲第一強國的德國，在歐盟內部則面臨英、法的疑慮。例如在歐洲中央銀行首任總裁的爭奪戰上，小國不願大國人選出任，支持荷蘭籍的 Duisenberg 擔任，法國則認為 Duisenberg 的背後是德國，執意推出自己的人選 (Der Spiegel 1997 (46): 168-170)。

五、結語

以上我們從三個層次討論了歐洲當今的情勢，但根本不企圖指出哪一種說法較為正確，因為事實上三股力量正在歐洲交互作用：全球化確實有某種程度的解民族國家化效應，就文化而言，民族國家至少不再是文化的唯一負載單位，不考慮國界的全球—地方文化辯證關係，確實越來越值得注意。而不管是從其本身的歷史教訓，或是在與全球化的辯證關係中，歐盟確實有脫離民族國家傳統的傾向，歐盟架構就某些層面而言是與任何從前的國家聯盟都不同的 (Schwarz 1994: 107-108)。然而在有關歐洲東界的問

題上，我們看到古老的宗教與種族界線仍起著強大的作用。然而僅以大文化圈作為衝突的單位，又顯然是過於粗糙的，民族國家仍依循著均勢 vs. 霸權的傳統邏輯，選擇最符合本身利益的結盟策略。

如此，要為當今的歐洲起一個架構，是徒然的！它是後民族國家的，但又不是；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在尋求和解，但又築起了衝突機制；歐洲急欲擺脫民族國家間和戰無常的歷史夢魘，然而歷史的幽靈不停止它對歐洲整合的吞噬。

至於德國，近兩個世紀不平凡的民族與國家建構—崩解的歷史經驗，換取的是難以承受的模糊與徬徨，遲疑在歐洲的德國、德國的歐洲的十字路口。世紀末，解構的歐洲、解構的德國。

引用書目：

Arnold, Hans

1997 Sicherheitsoptionen für Europa, Aussenpolitik (48):
39-48.

Beck, Ulrich

1997 Was ist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Der Spiegel

1997 (46)

Deutscher Bundestag

1989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Bonn.

Elvert, Jürgen

1997 Im Schatten der Europa-Politik: britische
Deutschland-Vorstellung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Aussenpolitik (48): 346-356.

FAZ (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1996.11.8

Flora, Peter

1981 Stein Rokkans Makro-Modell der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Europas: Ein Rekonstruktionsversuch, KZfSS: 397-436.

Graf von Krockow, Christian

1990 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 (1890-1990), Reinbek.

Handelsblatt

1993.5.13

Hoppe, Hans-Joachim

1997 Moskau und die Konflikte im früheren Jugoslawien, Aussenpolitik (48): 245-256.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Kampf der Kulturen, München.

Masala, Carlo

1997 Debatte über die institutionelle Reform der EU, Aussenpolitik (48): 228-236.

Meier, Christian

1991 Die Nation, die keine sein will, München.

Rokkan, Stein

1973 Cities, States, and Nations: A 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 p.73-97 in S. N. Eisenstadt & Stein Rokkan (edit.): 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 I, Beverly Hills.

1975 Dimension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 possible Paradigm for Research on Variations within Europe, p.562-600 in C. Tilly (edit.):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Princeton.

1980 Eine Familie von Modellen für die Vergleichende Geschichte Europas,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9): 118-131.

Ruge, Peter/Elisabeth

1990 Nicht nur die Steine sprechen deutsch..., Frankfurt.

Schmidt, Helmut

1990 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chbarn, Berlin.

Schmidt, Peter

1996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im Rahmen von EU, WEU und NATO, Aussenpolitik (47): 211-222.

Schulz-Vobach, Klaus-Dieter

1989 Die Deutschen im Osten, Hamburg.

Schwarz, Hans-Peter

1994 Die Zentralmacht Europas - Deutschlands Rückkehr auf die Weltbühne, Berlin.

Simon, Gerhard

1997 Die Identität Rußlands und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Aussenpolitik (48): 245-256.

Stürmer, Michael

1988 Deutsche Fragen oder die Suche nach der Staatsräson, München.

Thurich, Eckart

1990 Schwierige Nachbarschaften - Deutsche und Polen - Deutsche und Tschechen im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Voigt, Karsten

1996 Das deutsche Interesse am Multilateralismus, Aussenpolitik 37: 107-116.